



品读《庄子》，不要光看“庄周梦蝶”

——杨立华教授在北大博雅讲坛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杨立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魏晋哲学的研究。出版专著《中国哲学十五讲》《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译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帝国的话语政治》等。

人生如同在茫茫的大海，有时遭遇惊涛骇浪，有时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即便在风平浪静之中，也蕴含着各种各样的不测。在充满偶然和不测的人生旅途中，经典的阅读、经典的力量就好像锚，可以锚定我们人生的力量。

多年来，我一直强调通过经典阅读来获得某种经典性的人生，把自己的人生经典化。它不是意味着我们自己成了经典，而是强调把经典的力量注入我们的心灵当中，然后去面对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局面和事情。

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听讲，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代替不了自己的阅读。通过对经典的深入阅读，我们能够接续上往圣先贤的思想，获得生命的沉淀。

庄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庄子的著述和思想，对于我的学术成长来说非常重要。我走进哲学之门，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最初引路的书就是《庄子》。记得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读到了《庄子》，从此欲罢不能。考上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之后，就开始跟随老师们进一步学习《庄子》。多年来，我的研究脉络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庄子，近来也一直围绕庄子在进行研究和写作。

《庄子》一书，将哲人的思考和评判融入寓言之中，通过人物之间跨越时空的对话传递哲学奥义。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没有思想家能够摆脱《庄子》的影响。那么，普通的哲学爱好者应该如何进入庄子的思想王国？如何理解庄子的文章之美？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阅读体会和思考心得。

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
栏目主编王珍邮箱：shhgscxh@163.com

■ 想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考，除了研读他们留下的文本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尤其像庄子这样的人，关于他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已

■ 《庄子》这本书的研读重点，我个人认为是“内七篇”，但这并不是说“外篇”“杂篇”就不需要去读。“外篇”“杂篇”是后世学者所为之，其中透露出的很多信息对我们理解庄子很重要

古时“解庄”非常难，难就难在文本很庞杂、注释比较多

历来对《庄子》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有的是学院派研究，有的是偏向于领会人生实践智慧的写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脉络，那就是注疏的脉络，即详细注解、解释，逐字逐句逐章地解读《庄子》全书。

应当承认，要想了解古代哲学家的思考，除了研读他们留下的文本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方式。尤其像庄子这样的人，关于他的历史记载非常少，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已。

注释《庄子》的作品非常多。在我刚刚着手研读《庄子》的时候，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对我影响很大。此外，还有一些注疏类的作品绕不过去。例如，钟泰的《庄子发微》对《庄子》的文本解读就非常细致深入。

我个人认为，儒家和墨家是可以称作学派的。因为它们既有思想传承，又有明确的传承属性。但道家有所不同，它没有明确的传承谱系，跟儒家、墨家相比更是明显。所以，“以老解庄”是我不能赞同的。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主题、思想宗旨和哲学关切点是有根本区别的。

“解庄”非常难，难就难在《庄子》的文本。《庄子》没有一个明确的口传传统。举个例子，读《论语》或者《孟子》，特别是《论语》，和它相关的解释传承几乎一直都没断过。因为有口传的传统，所以《论语》不管有多少种解释，都有一定的统一性，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是大家不会去质疑的。

但《庄子》不一样，《庄子》文本本身就庞杂，到魏晋时期才受到普遍重视，才开始有较多的注释。直到郭象把《庄子》的文本进行重新整理

并加以注释，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庄子》文本才确定下来。这就导致庄子的哲学有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隔阂。结果是，不管哪一代研读《庄子》的人，大体只能面对手里的文本去跟庄子对话。

由此，非大哲学家是不能“解庄”的。你没有那种思考能力，无论有多深的训诂功夫都没有太大的用处，而必须要有根本的、足够深的哲学思考。换句话说，对《庄子》这种没有口传传统、有历史隔阂的经典文本，需要有哲学心灵的人才能解读好。

在《庄子》的注疏脉络之中，有一本书非常了不起，那就是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夫之本人就是一个大哲学家，可以在很高的哲学高度上“碰见”庄子，可以经由对话不时透射出庄子的哲学高度。

朱子注《四书章句集注》时，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理念：注的内容不要太多，不要用自己的注湮没了经典本文，经典本文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朱子作为一个大哲学家、文学家的清晰认识。不管我们的文字多重要，不管我们的解释多细致，都不能遮盖经典本文。钱穆在《庄子纂笺》中，也贯彻了这一理念。他广泛搜集资料，把重要的内容汇集在一块，既不失简明，又显得广博丰赡。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庄子哲学思想，严格意义上讲是经过郭象整理之后的版本。尽管郭象注可能在很多地方明显曲解了《庄子》原文的意思，但真正读进去，会发现郭象的注释在很多地方确实有深契于《庄子》哲学的地方。深契《庄子》哲学的地方，就是哲学的对话，是一个哲学家向另一个哲学家的致敬与质疑。

“或类《山海经》，或类《占梦书》”，52篇删削整理为33篇

《汉书·艺文志》里面著录的《庄子》是52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为33篇。33篇文本的《庄子》，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是郭象删削整理的结果。

郭象发现，他原本看到的《庄子》“外篇”“杂篇”里，庞杂的东西太多，“或类《山海经》，或类《占梦书》”。这样的东西不可能是庄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所留下的正式文本，所以郭象就把相关部分删掉了，并且对剩下的篇章进行整理归类。

那么，“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全都是庄子本人写的吗？苏东坡进一步提出，至少有4篇非庄子本人所著，即《说剑》《让王》《盗跖》《渔父》。

王夫之在《庄子解》里更是讲，“外篇”15篇

全都不是庄子所作，而系“后世学庄者为之”。这是了不起的见识。他为什么这样断言？因为王夫之本人就是文体家，他看得出庄子的行文风格。例如，王夫之评价其中一篇说文字“欲美肤俗”，这怎么可能是庄子写的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而“外篇”“杂篇”不是。但即使持这样观点的人，也没有特别充分的根据，拿不出充分的理由。王夫之对文章的感觉是非常个性化的，这种感觉又难以传达给大家，没有办法作为有效证据来说。

但也有一些大学者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任继愈。任公一直在讲“外篇”“杂篇”是庄子本人所作，而“内篇”不是。他的根据是《史记》，司马迁为庄周作传并引用了《庄子》的话。任公注意到，司马迁引述的话

和篇名，都在“外篇”“杂篇”中。

不得不说，这个证据我们是无法轻视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离《庄子》都比司马迁离《庄子》远得多，司马迁能看到的资料肯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

上世纪80年代初，刘笑敢在其博士论文《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的开头部分进行了详尽考证，试图把这个“疑案”予以解决。按照汉语的发展，单字词的出现是早于双字词的，一定先有单字，然后再有组合字。他注意到“精神”“道德”“性命”等几对概念——在“内篇”里，“精”“神”和“道”“德”没有出现连用的情况；“外篇”“杂篇”里开始频繁出现这些字的连用。

有人反驳说连用也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词，而是在讲“精”和“神”、“道”和“德”。《天下》篇讲庄子“与天地精神独往来”，这里的“天地精神”显

然是连在一块的，是一个完整的词。一旦明白这一点，就能够证明一件事：“内七篇”整体上早于“外篇”“杂篇”。

通过这个线索，还能够进一步确定年代关系。把《庄子》和其他经典加以比较会发现，跟《庄子》同一时代的，如《孟子》，还有早于《庄子》时代的，如《论语》，里面都没有“道德”“精神”“性命”连用的情况；而偏晚的经典，如《荀子》《韩非子》已经开始频繁出现这些词的连用。由此可以基本确定，“内七篇”整体上早于“外篇”“杂篇”。

基于统计还可以看到，《庄子》“内七篇”里概念的交互使用频率极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七篇”的整体性。《孟子》也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庄子》的“内七篇”和《孟子》是同一时代的文本。根据历史记载，孟子和庄子恰恰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用虚拟对话讲述“至德所知”

《庄子》这本书的研读重点，我个人认为是“内七篇”，但这并不是说“外篇”“杂篇”就不需要去读。

“外篇”“杂篇”是后世学庄者为为之，某种意义上也是后世学庄者对“内七篇”的理解。其中汇集的文献、篇章离庄子活动的时代很近，透露出的很多信息对我们理解庄子很重要。而且由于后世学庄者对庄子的某些思想片段有充分发挥与展现，所以有些篇章也很妙。

很多人以为，《庄子》之美在于“庄周梦蝶”。其实，要真正去体会《庄子》文章之美，不要光看“庄周梦蝶”“庖丁解牛”。

《庄子》文章中，非大手笔不能为的是哪部？是《人间世》。尤其是《人间世》第一章，要编出一段颜回和孔子之间的对话，而且颜回每次说的话，在孔子的提点之下还要不断提高，既要符合颜回的思想、符合他的个性，又能在孔

子引导之下不断提高，是非常难写的。

如果庄子今天还活着，绝对是一个伟大的编剧，什么细节都要注意到，基本不穿帮。当然，也有个别马脚被我们发现了。比如，庄子特别喜欢“十九”这个数字。庖丁那把刀用了十九年；《德充符》里“吾与夫子游十九年，而未尝知吾刀者也”，也是十九年。为什么都是十九年呢？因为说十一年太少，说二十年太整齐了，说十九年看着像真的，时间又足够久，接近二十年。

庄子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虚拟对话写作”方式呢？之前的作品中，即使有对话，也都是实际发生的。例如，《孟子》的对话可能有点润色，但孟子说谁谁、跟谁辩论，实际过程中都是发生过的。《论语》也基本上是实录，直接讲孔子怎么说的，最多文字上有所润色。

但《庄子》可以算是编的，这是为什么呢？庄子后学对此展开了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寓言篇》。它

在解释庄子为什么这样写的时候讲法比较肤浅，大致的意思是借着外人的口来说更有说服力。正如父亲不能为儿子做媒那样，父亲为儿子做媒就夸自己儿子，别人怎么会信呢？因此，要借别人的口来说，要“重言”。“重”就是引重人之话，借用历史上、传说中那些伟大的圣贤来说话。

《寓言篇》用“寓言、重言、危言”解庄子的讲法，其实是一个庸俗的想法。如果庄子是这样的话，那以他的才华为什么不游学于覆下学官，反而守在漆园呢？其实，他根本没把上面的那个担心当一回事。理解这一点以后，我们也知道以《寓言篇》理解之庸俗，断然不会是庄子所写的，他并不想取重于世。

庄子这样写的关键在于“说不可言说者”。在“内七篇”里，所有的“至德者”都是沉默的，都没有说话；反过来，只要说话的，都没有达到“至德者”的最高境界。

比如，《逍遥游》第三章中“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只在两个人的描述中出场；再如，“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杳然丧其天之为”那一段，那个“四子”同样也没有出场。因为，“至德所知，不可言说”。既然“不可言说”，那只能在沉默中表达，即通达事物之理而无壅塞。

所以说，庄子是一个诚实到了极致的人。他认识到哲学的语言困境、表达困境，认识到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达到这一认识高度的，不是只有庄子一人，但只有他停下来了——

至德者的所知、所见应该归于沉默，如果陈述的这个人没达到“至德”，那他所说的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于是，庄子尝试利用“问道者”和“问道者”的对话，煞费苦心地将“至德者”的“不可言说”，将最根本的真知表达出来。（整理人：周丹旌）

消费 市场 专版

刊登内容

-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

医院进入紧急状态

后来证明孔晴宇当时的判断完全准确，18日的那位商人患者和怀孕的患者及22日送进的男性患者全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而且全部死亡。“当时这三位患者入院和治疗过程中，我们整个医院根本不知也不懂得如何进行‘埃博拉’病毒的防护，尤其是我们这些参加诊断和治疗的医生，不止一次与患者近距离接触，这意味着他们或者已经被‘埃博拉’病毒感染。如果这几个参加接诊和治疗的医生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们又每天像平常一样回到大家中间，同吃同住、打打闹闹、搂搂抱抱，这不等于全体人员都处在‘埃博拉’的伏击圈内嘛！一想到这儿，我毛骨悚然，大汗淋漓。晚上，我把在几内亚所处的困境和当时的危急情况向国内的计生委以及我所在的安贞医院领导做了汇报，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提供有关‘埃博拉’病毒的基本知识和防治措施……”

这一夜，孔晴宇彻夜未眠。其实另外18名中国医疗队员也是彻夜未眠。大家都在为两位直接接触疑似“埃博拉”的队友——曹广和吴素萍担忧。在为战友担忧的同时，还重重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深的忧虑：曹广和吴素萍大夫每天与我们所有的人工作、生活在一起，万一他们患上了“埃博拉”，我们这些人会不会也……

这一夜，几内亚整个国家也过得不容易。在前一天公布自己的国家暴发“埃博拉”病毒后，身处病毒原发地的地区似乎并没有人对此重视起来，依然我



死亡征战：

中国援非 抗击埃博拉纪实

何建明 著

行我素。政府官员哪里知道，那些处在极度贫困的国民和患者清楚一件事：一旦自己被怀疑患了“埃博拉”，必定被强行送进医院打上致命的一针，被其他人强行送上“文明的断头台”——当地居民在遇上瘟疫时，饱受这般的“待遇”，因此他们把政府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文明的断头台”。

面对“埃博拉”，穷人如此，富人则不一样，他们感觉情况不妙，便会不顾一切地想尽办法从四面八方赶到首都，找到最好的医院——中几友好医院，他们知道，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可能拯救他们生命的只有中国援建的这所医院和中国医生。其实18日曹广等接诊的那个患者，就是这种情况。他本人就是一位有钱的商人，当他在“埃博拉”疫区做生意时感觉不舒服，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花大价钱雇人将他弄到中几友好医院，以求不死。两天后，这位有钱的商人确实也见到了中国医生，事实上中国医生也极其负责地给他救治。但由于大家都不知道“埃博拉”是咋回事，而且世界上根本没有发明可以阻止这种病毒继续进攻的药物，更不用说如何治疗了。

孔晴宇平时是个极其冷静的大夫和

专家，他是心脏搭桥手术的一流专家，他的承受能力也是一流的。他接受我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在最危急的时候，身在其中的高明的医生一般是不会恐慌的，越淡定，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越能发挥好。但2014年3月下旬在科纳克里的那些天里，尤其是刚刚得知自己的队员与“埃博拉”患者有过亲密接触时，我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尽管表面上在大家面前保持着镇静，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其实无法形容。”一年多以后，孔晴宇坐在他那狭窄的安贞医院办公室，这样对我说。

第二天即2014年3月25日，孔晴宇以中方院长和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名义，召集中几友好医院全院医护人员尤其是中国医疗队员，宣布：前几天医院接收的“一号”“二号”“三号”是严重的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从今天起，医院需要进入紧急状态，接诊、收治病人，治疗和后勤等所有环节，必须按照防治“埃博拉”要求执行。

“你们在原地休息。今天到医院交班就我一个人去，其他队员全部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得外出。更不能擅自到院外面去，要出去必须向我请假。”孔晴宇对中国

医疗队员下达死命令。

“队长，我还得跟你去。”是翻译罗丽在说话。孔晴宇点点头：“你跟我一起去。”

之所以这样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一是孔晴宇凭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既然“埃博拉”是比“非典”还要高一级的通过相互接触和血液、黏膜、飞沫传染的烈性病毒，在无任何药品可以治疗的情形下，隔断与病毒的接触和尽量让病源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无药可治的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二是与他昨晚跟国内不断联系所及时获取的“埃博拉”知识有关。

“但最主要的是我对医院当时已经出现的实际情况和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做出的专业判断。”孔晴宇说，“虽然在当天的会上我没有直说已经肯定我们的医院已连续出现‘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但在我心里已经作了肯定。正是这份专业判断之后的肯定，让我第二天正式在全院和中国医疗队面前做出果断决定。要知道，通常情况下，宣布这样的决定，是需要有病毒标本并经专业实验室测验结果报告出来后才可做出的。可当时的情况已经十万火急。”

战争时，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决定整个战役的成败；在不可抑制的病毒疫情袭击下，一天、半天的时间同样可以决定数以万计生命的存亡。孔晴宇功不可没！一年后的2015年9月26日，联合国授予孔晴宇他们中国援助几内亚第23批医疗队“南南合作奖”，表彰他们在几内亚抗击“埃博拉”中做出特别贡献并坚持长达六个月之久的卓越功绩。这个荣誉在中国援非医疗队及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诸多队伍中也是独此一家。

(二)

连载